

精神符号学与精神文化符号学之辩^{*}

吕红周

摘要：面对日益复杂化的全球性危机，我国学者从符号学出发开展了有益探索，先后提出了建设精神符号学和精神文化符号学的设想。本文尝试对比分析精神符号学、文化符号学以及精神文化符号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基础等方面内的内在一致性与差异性，进一步推动我国符号学研究的本土化进程。

关键词：精神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精神文化符号学

The Debate between Semiotics of Mind and 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

Lü Hongzhou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ly complex global interactions, Chinese scholars have explored the usefulness of semiotics and have successively advanced the idea of building theories of semiotics of mind and of the 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semiotics of mind, cultural semiotics and the 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 in terms of research objects,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oretical fundamentals,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the localisation of semiotic research in China.

Keywords: semiotics of mind, cultural semiotics, 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

DOI: 10.13760/b.cnki.sam.202301020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儒家经典俄译符际文化信息守恒与失衡研究”（19BYY211）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在科学和技术主导下的20世纪，人类获得了物质的极大富足，但同时也深刻改变了地球，引发了日益加剧的全球性危机，如恐怖主义、分离主义、极端主义、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缺失、局部战争风险等，“上帝已死”之论引发了人类信仰世界的无序与混乱，时代需要重振精神。在科学与技术裹挟下，人类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伦理责任。精神与世界从来都是两个并行的符号系统，历史上精神充盈与虚无的每一次交替，都是人类文明的更新。以文字为标志的人类文明先后经历了轴心时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阶段。雅斯贝尔斯（K. T.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迪利（J. Deely）将人类的理解分为希腊、拉丁、现代、后现代四个时期。不管是基于人类发展阶段，还是以人类理解的特征为依据，21世纪亟需一种新的文明方式，超越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推动多元主义的文明对话。

在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时期，我国学者从符号学视角给出了自己的思考。精神符号学（semiotics of mind）是对20世纪以来世界性精神危机的一种学术回应，重点关注人类精神现象中的符号作用，研究人类精神发展和意义生成，侧重符号的精神价值性内容及逻辑（李思屈，2015，pp. 9–10）。而精神文化符号学（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则“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人类社会精神文化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人与自然、个性与社会和谐为追求”（张杰，余红兵，2021，p. 4），以应对精神危机和情感缺失的加剧给人类带来的困扰。无论是精神符号学还是精神文化符号学都是新近提出的理论设想，仍处于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目前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存在各自的倾向。本着澄清概念、确定信念、推动发展的初衷，本文尝试对比分析精神符号学、文化符号学和精神文化符号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旨趣和理论基础等方面的异同，进而在对话与互动中推动符号学研究在我国的本土化进程。

二、研究对象对比

要定义一门学科，往往离不开研究对象、功能、范围、过程、方法等视角，符号学目前的研究也遵循着这一路径。关于符号和符号学存在诸多不同

的界定，如：符号是一个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两面心理实体（索绪尔，1980，p. 101）；符号是符号载体、对象、解释项构成的不可化约的三元关系（CP 5.473）；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赵毅衡，2012，p. 27）；符号是人类社会精神文化活动的产物（张杰，余红兵，2021，p. 7）；符号学是研究符号和符号系统的科学，符号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科学的工具（Morris，1938，p. 2）；符号学是一门文化逻辑学（Eco，1976，p. 1）；符号学是关于信息交际的系统（Степанов，1971）；符号学是对符号活动的总体研究，符号活动即为各种交流施为者所使用的、所有形式中的意义生产与再生产、接受与流通的操作和效果（霍奇，2012，p. 260）；符号学是一门研究多元化意义生成的工具性科学，以多维的视角和方法来揭示意义生成的无限性（张杰，余红兵，2021，p. 9）。

据中国知网，我国学者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精神符号学研究，理论方面《精神符号学导论》（李思屈，2015）、《精神符号学的概念、方法与应用》（李思屈，2021）两篇文章较为全面地阐释了精神符号学提出的背景、核心概念、研究路径以及发展趋势等宏观问题，提出“精神符号学研究人类精神发展和意义生成，偏重价值性意义研究，因为表征精神世界是人类符号行为的特有属性”（李思屈，2015，p. 2）。而《文化产品互动营销的精神符号学本质》（赵小波，2019）、《AI 时代精神符号学与文化产业的内在逻辑》（臧金英，2020）、《动画符号学建构的阿基米德点探析：基于精神符号学的研究》（李涛，2021）等文章则是在精神符号学框架下开展的应用探索，涉及文化产品营销、AI 技术与文化产业融合以及动画符号学建构等社会热点和前沿问题。精神不等于理性，卡西尔用“人是符号动物”代替了“人是理性动物”的定义，“精神的感性存在，就是符号化的存在……精神符号学以人类的感性行为及其成果为依据，通过具体可感的符号来理解精神”（李思屈，2021，p. 8），“精神不等于文化……时代的需求、现实的发展，就是精神符号学存在和发展的依据”（p. 10）。可见，这里的“精神”与黑格尔狭义上的“社会意识、时代精神、民族意识等群体性意识”这种客观精神，和“包括意识、自我意识、社会意识、绝对精神”（贺麟，王玖兴，1981，p. 16）的广义精神，既有联系，又不完全等同。当今“理论的精神贫困、生活的精神缺席”（李思屈，2021，p. 18），众多能指变得空洞，它们需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获得重新阐释，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开始形成。精神符号学的历史使命是在世界格局大调整与全球文明对话语境下促进人类信仰重建与价值传播（p. 3），其核心原理是通过在场者唤起不在场者（p. 1）。

□ 符号与传媒（26）

1973年《文化符号学研究纲要》的出版标志着文化符号学创立，其内容涉及文化符号系统的结构、意义、功能、文化发展的符号机制等，研究文化思想史中的意识形态与符号系统关系，区别于法国符号学对人文话语的意识形态批评分析实践，其中俄罗斯文化发展的两极性（биполярность）、双中心性（двуцентровость）是俄罗斯文化的一般特性，文化符号学通过对文化的历史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来揭示文化深层的意识形态结构。“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企图发现文化历史发展中的基本观念模式，并以此为基础来译解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文化社会现象，他们所从事的是一种文化类型学研究。”（管月娥，2011，p. 88）

而“精神文化符号学”提出时间略晚于“精神符号学”，目前主要文献有：“A 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 A Manifesto”（Zhang & Yu, 2020）、《反思与建构：关于精神文化符号学的几点设想》（张杰，余红兵，2021）、《三心合一：精神文化符号学认知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知”》（陈中，姚婷婷，2021）。精神文化符号学强调文化与精神的不可分割，不存在没有精神内涵的文化，也不存在脱离文化的精神，精神文化符号学研究作为文化现象的符号过程及固有的精神联系，符号和符号、符号和对象、符号和使用者间智力的、心理的、情感的创造性过程和认知状态（Zhang & Yu, 2020）。张杰和余红兵（2020）认为，要发展符号学分析范式的中国化方案，应从东方经典哲学智慧和美学中寻求认知模式、综合思维方式和分析方式，他们提出了以“天人合一”认知模式为基础的精神文化符号学（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①，融意识（mind）、生命力（vitality）与创造力（creativity）于一体，综合体验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和思辨认知（cognition via knowledge/abstraction）为新的方法论基础；在精神文化符号学视角下，符号是携带人类精神的社会文化活动的产物，符号学不再限于研究符号、符号关系、符号过程规则，更是要关注人类的心智能力改进、认知空间拓展以及思维解放，追求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和谐，推进国际符号学的建设性对话。

^① 2019年11月在由安徽师范大学承办的第七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高层论坛上，张杰教授做了题为“关于精神符号学的几点构想”的主旨发言，提出我国的符号学研究在引进、阐释和批判阶段后，一项重要工作是深入挖掘和发展立足中国文化的本土符号学思想，在与世界符号学积极对话和碰撞的基础上，早日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符号学。

三、研究方法对比

谈及符号学的方法论意义，赵毅衡（2011，p.197）指出，“符号学是人文社会科学所有学科共同的方法论，被称之为文科的数学”。符号世界成为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间的必要通道或媒介，人不能直接认识客观世界，即人的认识活动离不开符号，以往人们所认为的客观世界只是符号世界的呈现。通过使用符号，客观世界的秩序和规律才被人把握，而秩序和规律本身就是一种符号系统。离散的、无序的世界在符号系统中成了一个整体的、统一的世界，客观世界也因此成为一个意义系统、关系系统。

对人类精神运动及其规律、呈现形态、分类、价值等的研究自古有之，集中体现在宗教、艺术、哲学、科学等领域。但精神符号学并非对符号表面或浅层价值的经验式感知与描述，而是对其深层历史与逻辑同构的探寻。在学理上尤其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与皮尔斯的逻辑学和符号学论著为依托，通过对符号活动的不懈阐释，最终无限靠近真理。“在中国，符号学的任务是对文化现象的底蕴作分析、描述、批判、建设，符号学必须帮助社会完成建设现代文化的任务。”（赵毅衡，2013，p.8）黑格尔把物质与精神对立，物质的本质是重量，精神的实质是自由。认识是一个三元运动，始于感官知觉，然后是感觉的质疑、思考和评判，最后是认识阶段，最高的认识必须是“绝对”所具有的知识，“绝对”即“全部”（罗素，2010，p.378）。黑格尔提出的“绝对理念”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神”，是关于思维的产物。

乌斯宾斯基曾把他们的研究方法归结为语言学倾向的符号系统观：“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从总的符号学思想和基本分析方法上来看，他们继承和发展了索绪尔的思想，代表着符号研究的语言学倾向，其特点在于利用语言学方法并借鉴信息论与控制论等现代理论来研究非语言学客体，即作为人类文化的符号体系，或者现实的文化符号结构，一般不去讨论抽象的符号分析方法，持的是符号系统观。”（管月娥，2011，p.87）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沉淀之后，尤其是核心人物尤里·洛特曼去世后，原苏俄文化符号学阵营的学术组织变得更加松散，研究方向也不再局限于文化符号学，出现了以卡列维·库尔（Kalevi Kull）为代表的生物符号学、彼得·特洛普（Peeter

□ 符号与传媒（26）

Torop) 为核心的翻译符号学^①等，因此，塔尔图学派又被称为后莫斯科 - 塔尔图符号学派或新塔尔图符号学派。

传统的理性科学努力排斥任何主观的和精神的因素，采取符合逻辑的归纳、演绎、溯因三大分析方法^②，以纯粹客观事实和规律为追求目标。张杰和余红兵（2021）把精神文化符号学的方法论特征归结为：中国符号学研究要探索自己独特的研究路径，就必须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根基，以中国古典哲学尤其是美学为依据，借鉴西方符号学研究的成果，把“有无相生”的思想、感悟式的“体知”方式与西方的归纳、演绎、推理等“思知”方式有机融合在一起。可见，精神文化符号学并非排斥科学和理性，而是要整体把握理性与感性的综合作用，发挥中国古典哲学的辩证观和整体观，即“精神文化符号学正是要以这种‘天人合一’的认知方式为基础，推崇人的自由，追求人与自然、个性与社会的和谐，把符号学研究视为揭示人的精神文化活动复杂联系的重要手段，以期为符号学探索一条既多元又统一的研究路径”（p. 4）。精神文化符号学在强调“精神”“象”“天”“道”等抽象概念的同时，尤其关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特征，警惕虚无和缥缈的思辨，避免成为难以把握的玄学。从这一意义上讲，精神文化符号学体现出了批判性反思精神，这是当前这个符号过剩时代需要人们警醒和关注之处，“在这个意义漂浮的后现代社会，观看经典出于自我认同的需要”，但我们同时要警惕“经典文本上附加的符号意义，替代了真实的社会关系，人们得到的是虚幻的满足”，批判精神和深度思考是我们作为符号动物的基本属性，“一个无须批评的文本，不是正常的文本；一个无须批判的文化，不是正常的文

① 关于特洛普的符号学思想可参见拙文《彼得·特洛普的翻译符号学观》（载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符号学视域下彼得·特洛普的文本翻译思想》（载于《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② 在《确定信念》（“The Fixation of Belief”，1877）一文中，皮尔斯主要论述了传统上常见的解决意见的方法，即惯常法（method of tenacity）、权威法（method of authority）、先验法（priori method）的不足，进而指出逻辑推理才是唯一的科学方法。我们在此简单回顾皮尔斯提出的四种解决意见的方法。第一，惯常法，即不顾任何相反的证据、冲突的观点、无情的事实，而坚持自己的信念。第二，权威法。由国家、教会、特定组织、团体等具有统治地位或一定影响力的社会机构，把观点灌输、强加给民众。第三，先验法。在皮尔斯看来，先验法优于惯常法和权威法，因为先验法本质上是一种探究的方法。“通过寻找与理性一致的东西来解决我们的信念，我们所寻找的信念与我们其他的信念是一致的……”（瓦尔，2003，p. 48），但先验法产生的信念具有不确定性，“今天似乎是最不可动摇的意见，明天会被发现是过时的”（CP 5.382n）。由于惯常法、权威法、先验法都无法产生确定的信念，于是，皮尔斯提出了第四种方法，即科学方法。“用独立于我们想法的东西来确定我们的信念”（瓦尔，2003，p. 49），因为经验常常会背叛我们，将我们引向错误的方向，进而皮尔斯给出了归纳法、演绎法和溯因法三种科学研究方法。

化”（赵毅衡，2016，p. 380）。要实现自由的意义和意义的自由并非任其发展，任何解释都已经是一种选择，有特定的出发点，反映特定的倾向，任何解释都只能说是有限度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对于个体而言，或许并不存在选择的自由和意义的自由。

四、理论基础对比

精神生产过程是人将无形的思想和观念符号化，同时是主体性对象化的过程。拉康的精神分析把世界分为现实界、想象界与象征界，现实界是想象界的动力，想象界是人的个体生活及其主观性，象征界是支配个体生命活动的秩序（远婴，1989）。可见，个体需经由语言实现主体化和个体化，融入社会文化秩序，是个体社会化和文化化的起点。符号是“承载精神现象的物质载体”（李思屈，2021），精神符号学“考察人类生活世界具体呈现的精神样态”，其核心原理是“通过在场者唤起不在场者”，但强调“精神不等于文化”“文化是精神的符号”，从而区别于精神文化符号学与文化符号学。这与皮尔斯的符号观具有内在一致性，“总体而言，符号是这样一类事物，它包括图像、症候、词语、句子、书、图书馆、信号、命令、显微镜、立法代表、协奏曲以及它们的效用（performance），简而言之，任何使人产生精神印象的东西，实际上都是产生于它自身以外”（MS 634, 16–17）。在符号活动中符号主体可能是通过自己的感知意识或无意识状态，对有形符号或无形符号开展运思行为，运用推理（归纳、演绎或溯因）将符号载体范畴化（像似符、指示符、象征符），并在区分直接对象和动态对象基础上得出直接解释项、动态解释项和终端解释项。符号活动能力使符号主体能思考和重构不在场之物、非直接之物和非有形之物，这源于符号的悖论，符号这一意义载体为解释意义而存在，但符号的存在恰恰说明了意义的缺席和不在场，这一悖论赋予符号联结在场和不在场的能力。

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概念是文本，“文本的第一次符号转换发生在文化集体记忆和个人意识的边界上”（Лотман，2000，p. 208），这种对话的有机互动不仅是信息的被动传播，更重要的是产生新信息，“在文化系统中，文学文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生成新的意义”（p. 201）。洛特曼进一步通过模式化系统和符号域解释文本是如何产生意义和交换意义的。“模式化系统是一个由元素及元素组合法则组成的结构，它和知识、思考或规则的对象整体处于一种固定的类比状态。因此，模式化系统可以被当作一种语言。以自然语言为

□ 符号与传媒（26）

基础获得补充性的超结构从而创造出的第二层面的语言的系统能够被恰当地称为第二模式化系统。”（Daniel, 1977, p. 7）符号域概念是对模式化系统理论的深入和推进，从对文化的静态审视发展到动态、渐进甚至爆炸的运动观，符号系统的运动（中心/边缘、突变、边界等）呈现了文化真实的存在与发展状态。“符号域是人创造文本和符号系统的独特能力”（Semenenko, 2012, p. 114），文本间差异和符号系统差异创造了交际需求，从而符号域又成为普遍的意义生成机制。洛特曼从自然语言是第一模式化系统、文化是第二模式化系统的假设出发，引入了文化文本的概念，且进一步认为，文本具有边界，正是因为边界的存在，一些文本的重要属性如层次性、连贯性等才得以实现。理解具有双重性，即一方面寻找共性，另一方面创造差异。边界的作用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分隔了符号域内和符号域外，区分了不同的身份；另一方面连接边界的两边并给予解释。洛特曼研究艺术和文化的宗旨在于创立文化描写元语言，进而为不同文化间的平等交际寻找平台。

文化符号学关注文本的符号功能、符号层级、符号结构、文化多相性，而文化处于不平衡、不均质的动态变化中。符号域是洛特曼为文化描写、文化生存、文化发展等文化类型学基本问题以及意义生成机制创立的元语言，为异质文化交流提供符号学方案。一个真正的全球化语境逐渐形成，符号域的空间扩张更加剧烈和迅速，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笼罩着地球的前所未有的巨大符号域，其整体性更加凸显。尤其是在当下，边界的力量被迅速淹没，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是互相镶嵌在全球符号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分，无论主动融入还是被动融入，发声还是沉默，都改变不了这一进程，这个时代已经从先验（priori）进入后验（posteriori）和合作。正如米哈伊尔·洛特曼（Lotman, 2002, p. 38）所言：“符号域不仅是一个新的概念，而且作为环境要求新的范式、新的逻辑，它的基础不是决定论而是对话。”

精神文化符号学更加关注人的主体性（吕红周，单红，2013）、主体间性以及符号间性（吕红周，单红，2014），强调符号活动的精神价值和表意方式，“人类的符号活动迥异于纯粹的自然科学，它首先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是无法与人的主体性或曰人的精神性相分离的”（张杰，余红兵，2021）。任何个体在具有种属性的同时，还具有个体特质，不仅是个体存在，还处于与不同个体的关系中，因此，也总是一种关系存在，与他者主体的关系主要形成了主体间性关系。主体间性是一种超越直接物理关联的间接性，不同于客观的和物理的联系，是超然的。文本的意义一旦遭遇解读行为，定会超出作者的意图，因为理解不可能是复制，理解总是伴随着前理解而展开

创造性阐释。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是对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批判，间性超越了这种二元对立，更好地观照了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共生共存关系。中国传统认知模式“天人合一”是科学思维与象形思维的融合，其间精神与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存在，没有不体现人类精神的文化，也不存在与文化无关的精神，精神文化符号学“研究作为文化现象的符号活动及其内在精神联系……不是人为地确定符号表征的具体意义，而是要尽可能多地揭示意义的可能性”（张杰，余红兵，2021）。

天地之道变幻莫测，圣人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作为人生高级阶段的追求，可见，为实现个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与统一需要毕生的探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稍加观察便可发现人们通过使用符号来表达美好的愿望和祝福。人们会在每年的除夕张贴春联、门神、窗花，挂灯笼、彩灯，舞狮子、扭秧歌、敲大鼓、放烟花等，这早已成为全体中国人民、海外华人庆祝春节的共同形式。如果我们从符号形式和内容（能指与所指）来分析，打扫卫生可以解释为“除旧迎新”；春联上除了语言文字符号的语义，红纸、黑墨（金粉）、字形字体、春联大小、印刷体还是手写体、是否阳文等共同构成一个多模态文本，通过组合的方式体现主人的心情、审美倾向、信仰，但其符号解释项无不涉及美好寓意、祝福、愿望。这一表意方式是对图像符号寓意的现实应用，图像思维凸显主观的或人工的模拟和表征，属于一种格式塔整体思维模式，对应分析思维，但并非反科学，这体现了符号学双重身份和作用中的人文特征。象形思维和表意方式是对语言表意的补充和完善，常用于揭示自然语言难以表达或反复无常的事物或对象。追求真善美、忠与孝、情感与理智、人性与自然的统一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探究内容。虽然提倡以中华传统文化为理论源泉，但精神文化符号学并未局限在中国，而是具有全球视野，“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精神文化符号学的最终任务就是努力在看似简单的符号标记中发掘尽可能多的意义，甚至可以是无限多的意义，实现意义的多元化、世界的多极化”（张杰，余红兵，2021，p. 11），从这一点上看，精神文化符号学与莫斯科－塔尔图文化符号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结 语

符号学作为一门科学是西方学界的产物，在我国经历了引进、阐释、批评等发展阶段，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根植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符号学本土化研究正有序开展，而精神符号学与精神文化符号学的提出正是这一研究

□ 符号与传媒（26）

趋势的代表。一个研究领域要成为一门准学科或独立学科需要从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目的论开展全面研究，无论是侧重符号的精神价值性内容及逻辑研究的精神符号学，还是以象形思维探究天理、追求天人合一的终极指向的精神文化符号学，都是令人向往和期待的领域，值得更加深入和全面的探究。

引用文献：

- 陈中，姚婷婷（2021）。三心合一：精神文化符号学认知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知”。*符号与传媒*, 22, 15–25.
- 管月娥（2011）。乌斯宾斯基与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俄罗斯文艺*, 1, 84–89.
- 贺麟，王玖兴（1981）。译者导言：关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精神现象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
- 霍奇，克雷斯（2012）。社会符号学（周劲松，张碧，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 卡西尔（2004）。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李思屈（2015）。精神符号学导论。*中外文化与文论*, 3, 9–19.
- 李思屈（2021）。精神符号学的概念、方法与应用。*符号与传媒*, 23, 1–24.
- 李涛（2021）。动画符号学建构的阿基米德点探析：基于精神符号学的研究。*符号与传媒*, 23, 25–38.
- 罗素（2010）。西方哲学简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吕红周，单红（2013）。语言符号的主体性反思。*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1, 19–24.
- 吕红周，单红（2014）。略论符号的间性本质。*外国语*, 2, 75–79.
- 索绪尔（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远婴（1989）。从符号学到精神分析学。*当代电影*, 4, 22–29.
- 臧金英（2020）。AI时代精神符号学与文化产业的内在逻辑。*传媒观察*, 8, 53–59.
- 张杰，余红兵（2021）。反思与建构：关于精神文化符号学的几点设想。*符号与传媒*, 22, 1–13.
- 赵小波（2019）。文化产品互动营销的精神符号学本质。*文化艺术研究*, 1, 24–30.
- 赵毅衡（2011）。符号学的一个世纪：四种模式与三种阶段。*江海学刊*, 5, 196–201.
- 赵毅衡（2012）。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赵毅衡（2013）。重新定义符号与符号学。*国际新闻界*, 6, 6–14.
- 赵毅衡（2016）。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Daniel, L. (1977). *Semiotics: An Antholog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Eco, U. (1976). *A Theory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Lotman, M. (2002). Umwelt and Semiosphere. *Sign Systems Studies*, 1, 33–40.
- Morris, C. W. (1938).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1, 2, 1 – 59.

Peirce, C. S. (1931 – 1958).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1 – 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ebeok, T. A. (1991). *Semio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emenenko, A. (2012). *The Texture of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to Yuri Lotman's Semiotic The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Zhang, J., & Yu, H. (2020). A 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 A Manifesto.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16, 4, 515 – 534.

Степанов, Ю. С. (1971). Семиотика.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Лотман, Ю. М. (2000). Семиосфер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скусство-СЛБ.

作者简介：

吕红周，湖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符号学、翻译学。

Author:

Lü Hongzhou, assistant professor of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Huzhou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semio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Email: 530952799@qq.com